孫犁與《大公報》的情緣

侯軍

世人咸知，孫犁是著名作家。由他開創的「荷花淀派」，雖然他本人並不認可，但在當代文學界卻得到普遍的認同，理論界也多把研究視角聚焦在孫犁的文學成就上。殊不知，孫犁一生的大部分時間，都在辦報辦雜誌。因此，我在《報人孫犁》一書中，在作家身份之外，將其同時定位為一位報人。這絕不是刻意標新立異，而是實事求是地還原孫犁先生文學與新聞雙軌並行的「文章功業」。

事實上，孫犁自青年時代就與報紙結下情緣——他在《寫作漫談》一文中，曾這樣回憶：「我住在石駙馬大街的一個小公寓裏，所過的生活，形式上頗類似一個作家。我也給報紙投稿。」

查檢《孫犁年譜》，我發現選登這些孫犁早期試水之作的報紙，正是天津《大公報》——

1934年4月26日，《大公報》副刊《小公園》刊發了孫犁的詩歌《我決定了》，署名芸夫。

1934年10月25日、26日，孫犁的《故都舊書攤巡禮》分兩次刊發於《大公報》第13版。此文見報時漏掉署名。27日，《大公報》特意刊登《本刊小啟》，說明《故都舊書攤巡禮》為孫芸夫君所作，因編輯疏忽，漏登署名，特為補誌。

1934年11月29、30、12月1日，《大公報·本市附刊》連續刊發孫犁的文化見聞錄《北平的地台戲》，署名芸夫。

這是孫犁在北京居停期間，使用孫芸夫或芸夫為筆名，在《大公報》上發表文章最為密集的一個時期。雖然此後辭職回鄉了，但在他心裏，對《大公報》依舊心心念念。他1982年曾寫過一篇《報紙的故事》，回憶他

在這段「鄉居」期間，渴求家人給他訂一份《大公報》的往事：「一九三五年的春季，我失業家居。在外面讀書看報慣了，忽然想訂一份報紙看看。這在當時確實近乎一種幻想，因為我的村莊，非常小又非常偏僻，文化教育也很落後。例如村裏雖然有一所小學校，歷來就沒有想到訂一份報紙。村公所就更談不上了。而且，我想要訂的還不是一種小報，是想要訂一份大報，當時有名的《大公報》。」

當時的《大公報》是一份全國性大報。孫犁說：「我認為這是一份嚴肅的報紙，是一些有學問的，有事業心的，有責任感的人，編輯的報紙。」

彼時的孫犁年方22歲，雖然失業在家，但他的眼光很高，志向很大，單從讀報而言，即可看出他的閱讀品味。「我認為《大公報》上的文章好。它的社論是有名的，我在中學時，老師經常選來給我們當課文講。通訊也好，有長江等人寫的地方通訊，還有趙望雲的風俗畫。最吸引我的還是它的副刊，有一個文藝副刊，是沈從文編輯的，經常登載青年作家的的小說和散文。還有小公園，還有藝術副刊。」

時隔多年，孫犁對這份報紙的版面設置、風格特色，依然如數家珍，可見他確實是《大公報》的一個忠實讀者，用今天時髦的說法，夠得上一名「鐵粉」了。孫犁先把訂報的心願向新婚的妻子透露了，他知道妻子有一點私房錢，他想讓妻子「借給」他三元錢，先訂一個月的報紙。但妻子一句：「你花錢應該向咱爹去要，我哪裏來的錢？」就把他「懾」了回來。

在妻子面前碰了釘子，他只好硬著頭皮去向父親要。父親沉吟了一下說：「訂一份《小

實報」不行嗎？」

《小實報》是當時北京出版的一份市民小報，屬於孫犁不屑一顧之類。他沒有說話，就退了出來。

父親還是愛子心切，當天晚上就答應了，說：「願意訂就訂一個月看看吧，集响多糶一斗麥子也就是了。長了可訂不起。」在鎮上集日那天，父親給了他三塊錢，他轉手就交給郵政代辦所，匯到天津去，同時還寄去兩篇稿子。

從這一天開始，那家遠方的報紙，成了孫犁每日的牽掛。報紙送來了，「我坐在柴草上，讀着報紙。先讀社論，然後是通訊，地方版、國際版、副刊，甚至廣告、行情，都一字不漏地讀過以後，才珍重地把報紙疊好，放到屋裏去。」

不過，妻子比較關心的還是他的稿子，有一天問他：「有了嗎？」孫犁明知故問：「有了什麼？」「你寫的那個。」孫犁回答：「還

沒有。」一個月的報紙看完了，孫犁的稿子沒有登出來，他心裏有一點小小的失落。但他卻捨不得把報紙丟掉。這一年夏天雨水大，孫犁結婚時裱糊過的屋子，頂棚和壁紙都脫落了。妻子跟孫犁商量：「我們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，就用那些報紙。」見孫犁有些遲疑，妻子就進一步說服他：「你已經看過好多次了，老看還有什麼意思？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下塊數來錢，你訂報的錢，也算沒有白花。」

孫犁聽妻子講得很有道理，就同意把舊報紙派上新用場——「我們就開始裱糊房屋了，因為這是我們的幸福的窩巢呀。妻刷漿糊我糊牆。我把報紙按日期排列起來，把有社論和副刊的一面，糊在外面，把廣告部分糊在頂棚上。這樣，在天氣晴朗，或是下雨颶風不能出門的日子，我就可以脫去鞋子，上到炕上，或仰或臥，或立或坐，重新閱讀我所喜愛的文章了。」

喜歡讀報的人，世上有很多；喜歡《大公報》的讀者，世上也有很多。但像孫犁這樣「珍視」乃至「仰視」報紙的讀者，大概世間罕見吧。

如今，我們追尋着孫犁的足跡，不惟看到了一個作家的成長之路，也同時看到了一代報人的非凡歷程。而這一切，其實都與那些糊在屋子頂棚上的《大公報》，有着最初的密切的關聯。

七日談

(廣東篇)

機關呈現角色心理 燈光布景蘊含巧思

幕後匠心打造 《大狀王》視聽想像

落海。李小姐追隨演出走遍上海、北京與香港，一場不落。

▲《大狀王》舞台設計的特色是留白。圖為「報應」一幕舞美的示範過程。

起)《大狀王》舞台設計團隊成員楊子欣(左起)、黃逸君、張正和。

團隊協作應對突發狀況

舞台不是靜態的藝術品，它亦要面對不同的環境與現場變數。隨着《大狀王》展開巡演，舞台設計也迎來新的挑戰。由於各地劇院的規模與結構差異巨大，轉台與燈光效果都需要靈活調整，往往要在原有基礎上進行近一半的修改，以確保呈現效果與故事氛圍一致。這意味着團隊不僅要反覆測試舞台尺寸，還要重新設計燈光路徑，力求在不同空間裏保持作品的完成度。

舞台的不可預測性，曾帶來驚險時刻。在北京站的一場演出中，布景某一部分突然卡住並損壞，演出一度面臨中斷的危機。楊子欣回憶道：「關鍵時刻，技術人員立即衝上台搶修布景，舞監則第一時間通知演員調整走位。」團隊協作緊密，臨場反應也相當迅速。事後有觀眾反饋，雖然肉眼能看出舞台有些異常，但整體效果並未受到明顯影響。回想起這一幕，楊子欣坦言當時緊張到落淚，但更多感受到的是團隊默契帶來的力量：「大家萬眾一心，才讓演出能奇跡般地延續下去。」正是這份齊心協作，讓舞台在挑戰中依然完整呈現故事。

「場場必到」的粉絲

來自遼寧的李小姐是《大狀王》的鐵桿粉絲。自2022年透過網上片段認識這部音樂劇後，她便深深着迷。疫情結束後，她幾乎「場場必到」，今年更追隨演出走遍上海、北京與香港，一場不落。

李小姐坦言，為追看這部作品已投入將近三萬元人民幣，但覺得完全值得：「因為每一場都有新的驚喜。」她並非單純「看戲」，而是帶着研究的心態欣賞，會記錄不同場次中演員的細微變化——例如北京7月17日那一場，劉守正飾演方唐鏡時流露出少見的脆弱；7月19日下午，丁彤欣演唱《雪地寒山》時帶着哭腔，令她印象深刻。「不同演繹，會讓同一個故事有不同的重量。」她也曾刻意選擇不同區域的座位觀賞，「前排能細看表情，後排則能觀察整體舞台。」除了觀劇，李小姐同樣熱衷於收藏「粉絲應援物」，例如角色立牌、透卡、插畫等。採訪當天，她展示了一個「秀秀打小人」的旋轉擺件，秀秀的手可轉動，營造出「無影手」效果，令她愛不釋手。在她看來，《大狀王》並不是快餐式娛樂，而是「一場期待已久的盛宴」。

音樂劇《大狀王》繼於上海、北京完成巡演後，現正回到香港展開第三度公演。日前本劇舞台設計團隊——舞台美學指導黃逸君、布景設計張正和及燈光設計楊子欣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，分享創作理念與舞台細節。他們亦展示如何運用雙層轉台、燈光與色彩，營造公堂、回憶乃至「心理煉獄」等場景氛圍；同時講述在巡迴過程中，因應不同劇院條件作出的調整，以及處理突發狀況的經驗。設計團隊表示，每一個舞台機關與光影變化都與劇情及音樂緊密結合，不僅呈現故事情節，也呈現人物心理的真實。

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(文、圖)

▲粉絲應援物「秀秀打小人」。

在《大狀王》中，那個如同命運羅盤般不斷旋轉的雙層舞台，無疑是整個視覺敘事的靈魂。巨大的圓形轉台之上嵌套一個可獨立運作的方形轉台，兩者的精密協作，幻化出公堂、回憶、水下世界乃至「心理煉獄」等情景。

雙舞台設置替代寫實

創作之初，團隊就確立了一個明確方向：擺脫傳統古裝劇寫實堆砌的窠臼，轉向更具現代感與象徵性的極簡風格。黃逸君在示範操作時解釋道：「我們最重要的決定，就是『抽空』(留白)。舞台不是倉庫，不是把所有東西搬上去就叫設計。我們要用最少的元素，去激發觀眾最大的想像力。」

這種理念在「報應」一幕體現得淋漓盡致。童年的阿細與方唐鏡跌入水中，命運驟然轉折。張正和回憶，團隊在討論這場戲時，「大家(的)共識就是『不能寫實』」。電影裏可以拍真落水，但舞台要追求意象與象徵。」於是，真水被「抽掉」，取而代之的是轉台的運動。黃逸君補充：「『掉進水

裏』給了我們最關鍵的啟發。當圓台旋轉、方台錯位時，那種天旋地轉的離心感，能讓觀眾身臨其境，比真水更能代入角色內心。舞台機械本身就在替演員「演戲」，告訴觀眾「他正被命運的漩渦吞噬」。因此，雙轉台不僅是舞台機關，更是一個精準的敘事儀器。每一次旋轉的方向、角度與速度，都與故事、音樂、情感緊密相扣，定下了整個舞台設計的基調——不是呈現現實，而是呈現心理的真實感受。

燈光色彩傳達情感記憶

在雙轉台與留白之外，顏色的選擇同樣是舞台設計的關鍵難題。張正和坦言：「其實我們沒有用太多顏色，大多時候都是盡量節制。顏色一旦太多，就會把觀眾的注意力帶走。」其中特別具有代表性的，是劇中反覆出現的一抹綠色。在「報應」一幕裏曾出現過的深綠色，到「終審」一幕當童聲響起時再次浮現。「它象徵着倆哥們的情感，隨着故事推進而出現或消退。」這樣的设计，正好呼應劇中的金句——「有幾多

邂逅，會終生也未忘記」。燈光的色彩成為一種情感記憶的載體，讓觀眾在故事的關鍵時刻，因為顏色的重現而被牽引，體驗到角色之間難以抹去的牽絆。

如果說整體設計勾勒出舞台的骨架，那麼細節上的打磨則讓它真正鮮活起來。從椅子的木質色澤，到燈光下微妙的偏啡色或透亮，都經過一次次調整。「我們試了很多輪，才找到那個既能暗合東方氣質，又能在燈光下變化的色彩。」黃逸君表示，所有色彩設計都與音樂及「舞台cue(指令點)」嚴密相扣：「有時候四秒就要轉一次色，跟演員、音樂、舞台動作全部同步，這是最需要處理、也最容易出錯的地方。」在一些經典場景中，舞台高度、燈光與布景層次都經過精心安排。例如被迫嫁給「肺癆鬼」的秀秀一幕，光影與布景的交錯，不僅塑造了壓抑氛圍，也強化了角色內心的掙扎。